



中国将进入“后经济学家时代”

卢周来

2009-11-16 10:51:56

来源：北京日报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带来了中国经济学的春天。近30年来，中国老百姓逐渐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启蒙，中国经济学界各种思潮、观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也已渐成气候，经济学家亦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逐渐成为这个社会中的明星。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学家在各种媒体上“露脸”的机会，可以说远超过任何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专家。经济学家在中国不仅仅是专门家，同时是布道者与先知者，并且还是公众人物。

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权威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始，就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经济学家的声誉也随之日渐式微。尤其是2003年“郎顾之争”以来，不仅仅是网络媒体上充斥着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指责，而且部分有影响的传统纸质媒体也加入了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及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与反思；甚至有媒体专门整理了所谓“中国经济学家十大笑话”，一时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面对他们在中国公众面前精心搭建的“样板间”倒塌，面对他们主张与推销的理论几被颠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几近失语的表现，加速了经济学家退出公众舞台的速度。

不过，从一般意义上看，经济学从社会科学中心地位逐渐滑向边缘，不仅符合规律，而且在发达国家也是有迹可循。

康德曾经指出，“启蒙运动”的后果，对于启蒙知识分子是残酷的。因为一旦启蒙的任务结束，也标志他们将从中心走向边缘。他的意思是说，启蒙知识分子呼吁的是现代社会到来，而一旦现代社会真的到来，因为分工以及由分工导致的异化，将使社会各阶层各种角色回归到原来各自的领域，这就叫做“诸神归位”。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也将回到他的学术领域，不再是这个社会中的思想引导者。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就讨论过所谓“思想淡出，学术突显”时代的到来，这就是启蒙的结果。

具体到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当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秩序一旦建立之后，经济学与经济学家也将复位：他们仅仅是专门家，而不再是知识分子，更不再是“布道者”与“先知”。“后经济学家时代”也就来临了。

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制度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初，中国社会公众需要他们进行市场经济启蒙，知道市场经济的各种好处；后来，各级政府需要他们在市场经济基本框架搭建方面进行指导；再后来，多类型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也需要他们提供支持帮助。但是，20多年后，关于市场经济的运作机理，普通百姓不但知道而且有切身感受；在经济体制上，市场经济已经是不归路，即使有人怀念计划经济，也回不去了。一定程度上，市场经济秩序已经基本成形；至于企业战略这一套，有更细微

的学科分工后的企业管理或财务专家。此时，自然轮与市场经济共生的中国经济学家退位了。

不过，即使如此，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社会大众尤其是网络媒体中所遭到的奚落嘲弄，却也绝非一句“从中心到边缘”规律使然所能解释的，这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问题相关，中国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笼统地说，西方发达国家基本解决了权力分配问题之后，再谈市场；而中国是在市场化之前，并没有解决权力平等分配。而正如公共选择理论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强调的，“权力的平等分配应该优先于市场”。但可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罔顾这一基本事实，仍然将一切归为“市场问题”。这难免使得他们反复推销的来自西方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准橘为枳”，甚至因违背中国普通人的常识而成为笑料。

2005年秋季，在“首届中国经济学贡献奖”评选过程中的一次讨论会上，我曾指出，中国经济学家挨骂，几乎都是因为他们在公共领域的发言，而非他们的经济学专业水平。其实，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与利益分配，恰就属于公共领域，而非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效率领域。在效率领域，经济学家构造的交易世界，往往是双赢的世界；而在公共领域，任何一项政策都面临不同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而决策者所要做的就是平衡利益冲突。也因此，两类问题所用到的工具并不相同。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公共领域解决利益冲突，在这一领域，由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利益分化，纯粹客观的经济学研究很容易被利益的缰绳牵着走，明智的经济学家更应该避嫌，否则，就明确摆出自己的利益，而不能以作为“公器”的“学术”来包装“私利”。因此，经济学的边界应该止于公共领域。

从中国现实情况看，渐进式改革矛盾累积的性质已经将这个社会的基本权力分配结构问题推到了不可回避的地步。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迫切需要协调，经济改革也反过来逼迫政治改革。此时，一方面需要在全社会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制框架，另一方面更需要全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智慧。所以，在经历了30多年经济大发展与体制大变迁之后，经济学家与经济学大概到了他们逐渐淡出的时候，法学与社会学工具更适应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需要。

当然，中国经济学家仍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的发展与改革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现在就断言“后经济学家时代”的到来似乎还稍早了些。但即使这一时代真的来了，也并非什么坏事，相反，这是经济学家“启蒙”任务已行将达到目的的表现。而且，从另外的意义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在“诸神归位”之后，对经济学与经济学家本身未必不好。一定程度上，当中国经济学家发现他们参与现实社会建设机会减少并且能力下降后，可能他们将不再特别热衷于思想，也不再特别热衷于“布道”与“预言”，转而更热衷于技术与学术，更能坐得住“冷板凳”。说不定，这个时候，所谓“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以及与国际现代经济学实现高水平接轨才真正有望，中国经济学家以及原创性理论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才真正有望。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转载请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